



学术名家文丛

罗秉英学术文选

罗秉英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罗秉英学术文选

罗秉英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秉英学术文选/罗秉英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2015 重印)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7-5482-1750-3

I. ①罗… II. ①罗…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340 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统筹编辑: 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责任校对: 严永欢 和六花
封面设计: 郑治

书 名	罗秉英学术文选
作 者	罗秉英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12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82-1750-3
定 价	58.00 元



学术名家文丛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罗秉英，男，广东兴宁市人。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以教学为中心，教书育人，治史务实。从20世纪60年代起，时为青年教师就一直接受和肩负校、系“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试点课”（后称“重点课”、“主干课”）的讲授和建设。讲授“中国古代史”外，还先后开设“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古代官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资治通鉴》研读”、“魏晋南北朝‘佚史’研究”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与周边省区关系”等课程或专题课。著作有《黄巾起义》、《国史纲要》、《文史拾趣》、《治史心裁》，主编《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和参编《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等；发表过《要重视“佚史”领域的开拓和研究》等四十余篇论文（详见“著述目录”。其中还包括有引导“学生自学”、培养“写作论文能力”的心得。多次受到省、校的表彰，并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发展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
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
为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目 录

Contents

要重视“佚史”领域的开拓和研究	1
《魏略》、《典略》关系试探	4
《魏略》的上限和下限	
——兼说《魏略》成书年代	16
《魏略》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兼评王沈《魏书》	24
章宗源《典略考》质疑	37
关于王隐《晋书》的评价问题	52
王隐及其《晋书》的史学思想	62
干宝及其《晋纪》	75
裴子野及其《宋略》	82
《宋书》诸志新议	89
魏晋六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	99
论我国农民战争与生产力的发展	109
黄巾起义述议	121
诸葛亮行法的历史地位	145
古代“王（后）”与“皇帝”称谓述议	155
试述魏晋南北朝行台与尚书台（省）的关系	169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台述议	182
先秦至南北朝云南与相邻省区的关系	191
汉魏时期云南社会经济兴盛述论	233

魏晋时期滇蜀交通与云南经济的发展	246
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内外交通的阻闭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	262
王羲之写字	276
漫话宰相的鲠直、宏量与悦媚	282
诸葛亮“自比管乐”与徐庶“相马”	287
作者著述目录	288

要重视“佚史”领域的开拓和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史学专著或者史学史的研究，着眼于“重点”研究，如“二十四史”，或者是今存可据的史籍。就此，三十五年来取得不少成就，出了一批成果，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也有不少经验。

但我国古代有着浩瀚的典籍，今存史著亦不足窥见其全，因而忽略或绕开大量散失的“佚史”的研究，要完满地达到上述要求和目的，是有困难的。就以我国史学发展时期的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的研究来说，便还是一个“空白”。这一时期史家们撰写的仅纪传、编年二体的史著，就达百部以上。以往对这时期所撰的史书，研究“重点”多限于几部钦定的“正史”。研究方法，有似行棋中“隔子打炮”，从《汉书》一下轰到西晋《三国志》，再轰到南朝《后汉书》，炮口一转便到北齐《魏书》。这种方法，似乎成了公式，“以点带面”，炮虽轰了，气氛还是沉闷得很。不言而喻，这样“提炼”出来的史学发展形态、思想和规律，难免偏颇，或有很大程度不实在。因为中间脱漏了许多重要环节，影响了对一部史籍的正确评价，还造成对有关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原委莫睹，乃至出现本末颠倒等谬误。

例如，对曹魏史家鱼豢所撰的《魏略》、《典略》的性质，及二者究竟是一书，还是二书的问题。其书已佚，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作二书说，以《魏略》为“正史”，《典略》为“杂史”。但他从《典略》中列举出来二十七例证（作为别于《魏略》），其例证本身就缺乏缜密审核，多见重复和错误。如举《文选》“卫夫人南子在锦帷中”条、《御览》“孔子至卫见南子”条，本是同一性质、同出一处的一条材料，而被分割为二，以证《典略》著录之“杂”。又如举《书钞》“子陵俱卧耳”五字

例，考其佚文系出自虞预《会稽典录》，章氏则误作《典略》所出。可见这些例证是缺乏坚实基础的，不足断《典略》别于《魏略》。但见今有的“史学编年”，对章氏考证不加深究，竟说：“实则《魏略》及《典略》各为一书，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言之甚详。”这不是忽略佚史的研究，所造成的偏信而失实的臆断吗？

在史体方面，鱼豢《魏略》（这里不含《典略》）是一部著述曹魏一代，以纪志传为体的断代史；东晋王隐《晋书》亦是一部著述西晋一代，纪志传俱全的史书，这对承受和巩固发展两汉开创不久的纪志传体都有它的地位。但近年出版的有关论著，只注意到陈寿三国史的阙“志”，阐述史体的发展，一是如说自司马彪《续汉书》有八志，“后来有许多史书，都不注意这一项”，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说；二是由于沈约《宋书》是“正史”，有志三十卷，内容上溯曹魏，中间包举西晋，因此动辄便以“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这一赞誉，全冠之于沈约，这不仅忽略了鱼豢、王隐等书有“志”篇的成就，还给人造成这一时期史体的发展，自陈寿三国史阙志以后，似乎到了沈约《宋书》，“志”才得到振兴起来的错觉。

众家佚史作者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也未得到应有的发掘和整理。如干宝独美《左传》而抑司马迁的《史记》，和从五个方面提出一套修史记事见解的《释五志》，以及袁山松提出的书史《五难论》等思想，都有其精当之处。并在这一时期“正史”作者中难以见到的专论，但在有关史学思想史著述中，也是疏而不述。还值得重视的是，早在两晋之际，面临天下大乱的王隐修史，就提出重在总结当代“华夷成败皆在耳目”的历史经验，并提出编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晋书·王隐传》）。这种求实致用、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亦被泯灭。相反，把晚于王隐一百年后，范曄作《后汉书》说到“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倒被誉为我国古代卓越史家，这与王隐观点相较，很难看出范氏前进了什么和是如何前进的。

总之，上述这些现象正是忽略“佚史”领域研究所造成的，也是“隔子炮”研究方法造成的。史学的发展，当似行棋中的“过河卒”，可以左右摆动，每移一步，都是有利于朝前推进的。众多的“佚史”及其作家与有限的“正史”及其作家，都是其中的“卒”，有的“正史”在各个方面

都能起到领头的作用，有的“佚史”在某些方面也有领头的。彼此相辅相成。因此，重视“佚史”，有利于“重点”项目研究的继续深入，有助于创作新的有关专著，给人以躯体健全，脉络端正，肌肉丰满而真实清新的感受。当然，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这是有意义的工作。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12月5日）

《魏略》、《典略》关系试探

鱼豢著述的《魏略》、《典略》（下文合称“二略”），是陈寿三国史《魏志》撰写的主要依据。“二略”今已不存，是一书，抑或二书，诸家征引、议者，尚存歧异。

首先是诸家征引的剪裁，“二略”互出兼录。《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以至《通鉴》胡注等，既引《魏略》，又引《典略》。又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下称《御览》）等的史事编纂，亦广为摭采。其中《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鱼豢《魏略》、《典略》、《魏典略》、《魏略旧志》等多称。

再者是有关书志编目的著录，互有相贸。《隋志》以杂史类云：“《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不云《魏略》；《新唐志》以杂史类只言《魏略》五十卷，不言《典略》。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亦只言《魏略》。唯《旧唐志》两者兼录，正史类云《魏略》三十八卷，杂史类云《典略》五十卷。这些著录，“二略”时分时合，所归部类性质和卷帙亦不尽同。

据此，诸家议者，存有二说。

认为“二略”一书者，有杭世骏《诸史然疑》云：《三国志》“注引《魏略》，又引《典略》，即一书也。《太平御览》直称《魏典略》焉”。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云：“按《隋志》无《魏略》而有《典略》，杭氏似并《典略》之要，其合二书为一，则确论也。”肯定了杭世骏的看法。

认为“二略”二书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鱼豢《魏略》只记曹魏，故以魏名”，若《典略》所载，“此类纪载既广，体裁亦

杂，与《魏略》断代为书者，一为正史，一为杂史”，并指认“近杭大宗（杭世骏字）《诸史然疑》又误以《魏略》、《典略》为一书”。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亦云：“杭氏以《御览》引《魏典略》遂为一书，不知《御览》称《魏典略》者，所以别唐人之《三国典略》。且裴氏奉诏注书，慎重其事，凡所称引例归画一，必不使一书两称，自诒诘问，此又显见者也。”这又肯定了章氏的说法。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57年重版）认为：“《隋书》作《典略》八十九卷，此实为《魏略》、《典略》之合本，应作《魏略》五十卷，《典略》三十九卷。”

以上论说，各具辞旨，皆有可取。但二者似有共同之点，即以隋、唐书志的著录互异，卷帙不一，以及诸家征引互出等以圆其说。对于“二略”性质、内容，以及佚文事义有什么异同，彼此均缺乏翔实的说明。“二略”一书说，没有说明“二略”的“异中之同”；“二略”二书说虽然提出“正史”与“杂史”之别，也囿于一般泛论，不足以明白“二略”不同的症结。因此“二略”关系还值得探讨。

对于“二略”的关系，这里先行提出几点看法以供参考。首先在认识上不应以诸家征引的方向为出发，即不应以征引的多寡，或是一事同引等现象为转移。因为征引，特别是存留于“类书”的佚文，总是断简残篇，为适应其事类排比，往往是削趾以适其履的。这些正是造成“二略”关系的种种假象。另者，史注征引，引者即使对“二略”间有所考，但未必着力。如裴松之奉诏注书，虽然郑重其事，但他所遵循的是“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①的原则，这种记注成法之存异，未必成为判断“二略”之宗旨。再者关于隋唐书志的相贸著录，也要具体分析，如“正史”、“杂史”之别，还各有自己的概念，不足嗜其一端以论证。当然这些情况，对于“二略”研究还是重要的。但解决“二略”关系的关键，在于掌握“佚文”这个特点，立足于遗存材料，深入到“二略”具体条文，了解它的内容、事义和性质，以及它的体例等方面，参考其他进行判定。如果说“二略”同出一种体例，同为曹魏一代断代史，那么鱼豢一人这种撰史雷同的做法，显得没

^① 《御览》卷五百五十七、卷二百四十二。